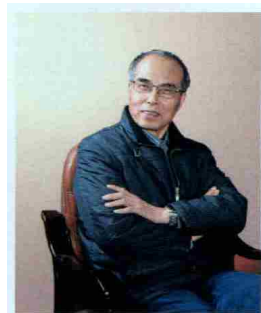


苦寻消逝了的壮美 秦都咸阳考古亲历记

文 图 / 王学理



王学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文史馆馆员。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担任过秦始皇陵兵马俑、汉鼎湖宫、汉阳陵等考古队队长。著有《秦都咸阳》、《秦俑专题研究》、《轻车锐骑带甲兵》、《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汉景帝与阳陵》、《秦都与秦陵》、《汉都长安城建史》、《咸阳帝都记》、《秦始皇陵研究》、《秦陵彩绘铜车马》等，合著有《秦物质文化史》、《秦俑一号坑考古发掘报告》、《秦文化》等。

1960年，我刚走出大学校门，即来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被安排在渭水考古队，从此踏上了“与秦结缘”的征程。我也立志：既然到了秦都咸阳，就要完成中国都城考古刚刚起步不久的这一考古课题，拿出“考古报告”奉献给学术界。但天不遂人愿，秦都咸阳考古这一叶小舟随政治波涛在颠簸不已。同样，我的命运多舛，也只能在夹缝中求贡献，留给自身惟有苦涩的一笑罢了。作为开辟秦都咸阳考古的参与者，回首逝去的岁月，真乃往事如烟，感慨系之。

荒原上的漫漫寻迹路

当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全称是“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后改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天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1958年9月成立的。一开始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暂时附设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次年，又借居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位于西安雁塔路南段）。创始惟艰，在王家广所长的领导下，经过多方筹措，就开始了业务建设。西北大学4位未毕业的大学生被抽调过来，这就算作研究所的第一批业务骨干。

在中科院考古所和省文管会、博物馆等部门均早已开展业务的背

景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要在十三朝故都西安立足，先进行了全省考古调查摸底和选点工作。此外王家广所长积极购置图书资料，以考古、史学为主，兼及文学，还大量收购当时尚未引起重视的地方志书和碑帖。在后来陕西省文博系统中，省考古研究所藏书质量之专、之高是得到业务干部赞许的。

秦都咸阳的考古调查，最初是1959年秋和1960年春进行的。根据《咸阳县志》和一些文献记载，只能大概推定秦都咸阳遗址在今咸阳市东。但这个相对的方位，是从前人陈陈相因的记述、传抄中辑来的，实际位置在哪里，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吴梓林队长的带领下，考古队在今咸阳东北长陵火车站一带，发现灰坑100多处、水井70多个、陶窑1座、夯土墙2处、水道11处和建筑基址12处。但这是不是就在秦都

咸阳遗址内，当时还是迷茫的。难怪王所长搔首长叹：“咸阳宫阙今何在？渭水河边一寸晖！”后因吴梓林忙于他事，致使咸阳的考古暂时告一段落。

也许是刚刚走出大学门又经过一年见识的缘故，当我来到了咸阳故地时重新调整思路，对秦都故址再做一次大面积的普查和重点复



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

查,便同吴梓林商定,在三个区域中选点,进行试掘:一是以牛羊村为中心的咸阳塬宫殿建筑遗址,二是长陵火车站附近的陶井群,三是滩毛村南的灰土堆积文化层。这样做的目的是:初步摸索秦文化遗存的内涵及其大致分布,为以后大面积钻探和正式发掘提供依据。

1961年11月,我们对咸阳塬的六号建筑基址(1974年改为一号)勘测,并在顶部试掘(即后来的第五室),发现有红褐色硬土地面、彩色壁画残块、烧结的具有精美图案的青铜构件。经过考古发掘的秦建筑艺术品的首次亮相,真使人耳目一新!

尽管墙壁坍塌,原来整幅的画面是看不到了,但大大小小的墙壁残块上,在白垩涂过的壁面上绘着菱形、方形等多种几何图案的条带,显然作连续排列,构成有似于“墙裙”的装饰。之前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人,谈起秦代的绘画,苦于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实物凭借,只好



四马一车图(秦都咸阳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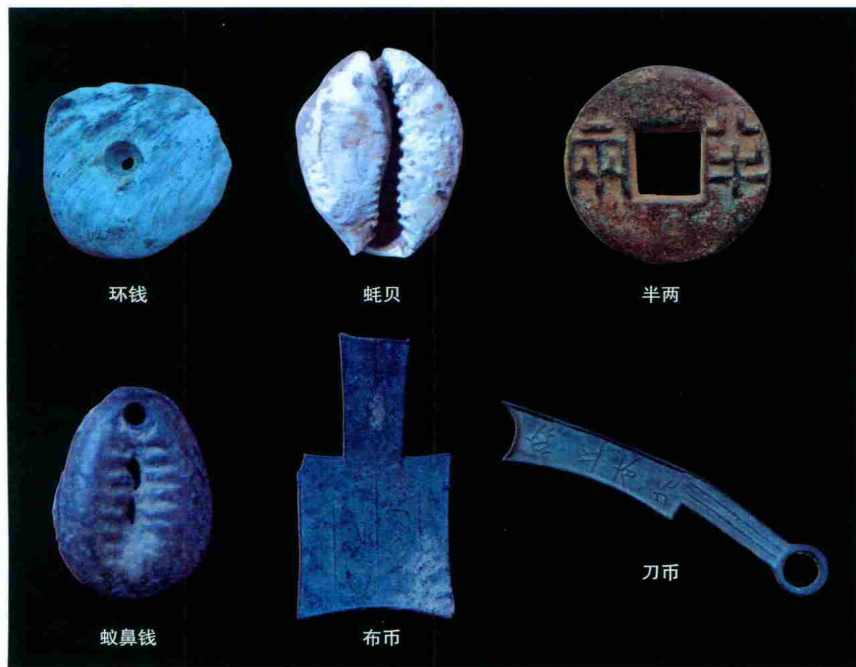
付之阙如了,带来秦“尚黑”、“清一色”、“无绘画”的误解。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手里清理出了秦代的宫殿壁画!虽然它们残破零碎,还不能构成大的画面,但作为一个信号,它给人们提供了管窥蠡测、稍睹秦画风采的机缘。当我站在寒风阵阵的高台遗址上,兴奋之情真难于自己。

紧接着,我们在长陵火车站北沙坑窖藏中,又清理出了1000多斤铜、铁器残块。经过郭希才师傅的除锈处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完整之物有:铜铺首、铜板材、铸锭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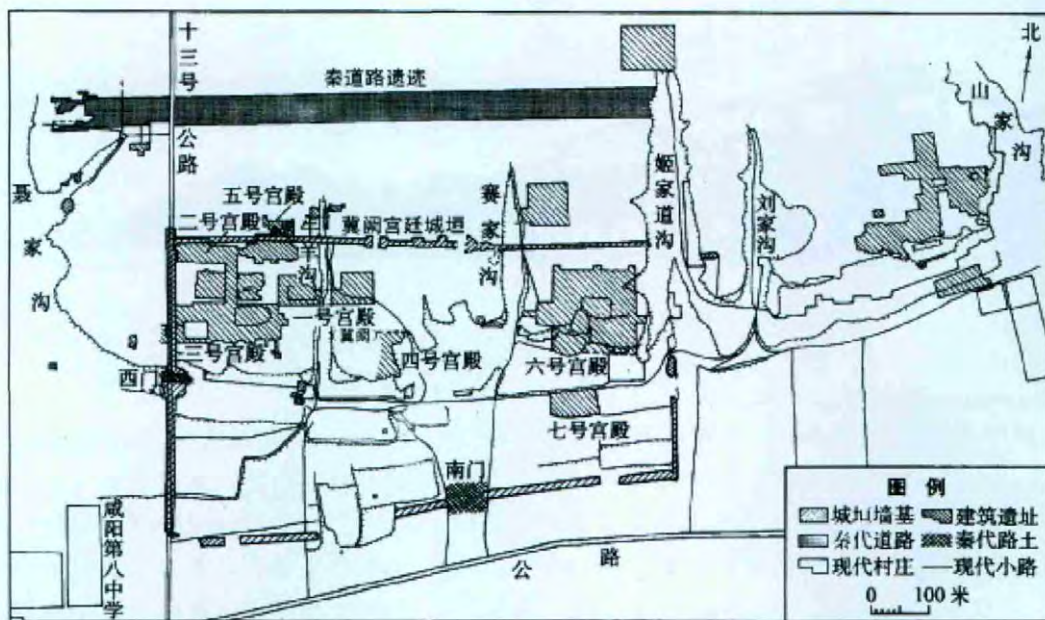
些叫不上名称的器物构件……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一块铜的诏版,非常完整,小篆体的40个字诏文异常清楚。

这件秦诏版,一下子使学者们的眼睛亮了起来。因为过去见到的秦诏版,都是些传世品。而现在呈现在面前的是考古的发掘品,又是出自秦的都城遗址上。地点如此明晰,其“珍贵”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

在第一次窖藏出土之后不久,第二次窖藏又接踵而至。1962年3月,正当考古所业务冬训期间,又接到农民在长陵火车站取沙发现“有情况”的报告。我独自赶赴咸阳,在南沙坑中又清理了一处窖藏。经过分层清理、绘图、纪录,然后把文物全部带回研究所。这批窖藏铜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器形完整、内容丰富,是上次窖藏所没有的情况,也是以后不曾见到的,总共有铜器280多件。其中生活用具有鉴、罐、鼎、盒、釜、提勺等,兵器有弩、镞、矛、戈等,货币中除秦“半两”铜钱外,



秦始皇铜诏版拓片(刻文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则明壹之。”))



冀阙宫址平面图

齐、燕、魏、楚等国的铜币就有15种,计达136枚之多。另有铜诏版、车马器、印章和各式铜带钩等等。

1962年,考古队仍然在滩毛村南的渭河北岸,继续选点发掘。固然这次参加的人数比以往多,但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饥饿、单位缩编和干部调动等等问题连锁反应,始终是困扰着吃“皇粮”的人们。因此,考古队的人员也就进出无常了。有一段时间,我被抽出来安排到图书室去。

经过一场“地震”似折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1963年算是稳定下来了。这一年,我也终于能安下心来搞“考古”了。咸阳工地,正像今日时髦的“减肥”一样,剩下的业务干部只有两个人。副队长郭长江,只领一个兵——就是我本人。他也常因公私事务待在西安,而田野工作就由我一个人承担了。“手气”还不错,共发掘了3座陶窑、5个窖穴,出土的陶器和窑具很多。这也使我的认识逐渐明朗起来:长陵火车站以南,以滩毛村为中心,东起店上村,

西至长兴村,并由此一线向南推进相当距离,就是秦咸阳生产日用陶器的民间作坊区。可惜的是由于渭河向北岸的侧蚀,已使制陶区沦陷于河滩之中,也就不好确定其南界了。

“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生活开始安定下来,业务也步入了正轨。但1963年12月18日开始,在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导下掀起了整王所长的“四清”群众运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稚嫩青年人怎么会知道“政治斗争”的背景!广大的群众整日整月以至于整年地完全卷入到无穷无尽的“揭发”、“座谈”中去。尽管“肚子话倒完了”,可工作组宁可让一个人给集体“读报”,也不能搞业务。这种“运动群众”的做法,久而久之,令人厌倦。1964年,总算乘“运动”的间隙,由我整理资料,把滩毛村的发掘和长陵火车站的清理写成了一篇简报稿——《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配备了图纸和照片,投寄到《考古》杂志去。

省考古所开展马拉松式的“四清”运动同随后的“文革”相接,在1969年“干部下放”,留城人员也于1970年归并到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牌子暂时消失了,秦都咸阳考古也随政治运动的“持久与深入”而无限期地搁置了起来。

我是只会跟着摇《毛主席语录》的人,在工宣队和“造反派”看来不属于“革命派”,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投机取巧的本领,就应该下放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我下放到黄河边上的一个山村。当天就去翻地劳动,后来又背玉米杆、修大寨田,一连干了19天。接着,又被抽出搞“运动”、管“下乡知识青年”。经过组织“考察”,以为能吃苦,遇事还算有点“主意”,就被正式安排到韩县公安局当了一名侦察员。当我被“就地消化”(陕西省革委会主任语)了几年之后,1972年,因为考古文博工作恢复的需要,我又被从下面“拔上来”,返回了西安。因为陕西省考古研究



冀阙复原图

所不存在了,我就被安排到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去。

回到西安干什么?当然还是老本行。我骑着自行车、背着水壶和笔记本,登上了“文物之旅”的途程。向南郊、去长安、溯河流、宿香积、步昆明、踏阿房、绕故城,把渭河南岸的几处秦汉遗址、墓葬给统统又踏查了一次。真的很过瘾!

还有一件挺新鲜的事,也很值得纪念。那就是《考古》杂志把我在1964年写的那篇关于咸阳窑址与窖藏铜器的简报要发表了。为慎重,编辑部再要“确认”一下。当时,革命委员会主任为了避免“名利思想”,不要出现执笔人的名字,就把原来署名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换成了“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勘查小组”。可是,这么一来,历史却被涂抹了。因为“简报”中写的1962年到1963年的发掘,而当时的陕西省文管会和博物馆并没有派人参加,更谈不上什么“勘查小组”。就是这么一篇“简报”,从脱稿到发表,前后经过了10年时间,而在上面留下的政治色彩却是如此地强烈!

1973年春天,当我再次来到这久违了的秦都故地时,面对人去物非的实际、文管会重“保护”轻“田野”的情况,为了恢复大遗址的主动发掘,经过一番“疏通关节”的活动,终于取得领导的支持。于六七月份,

冒着酷暑,我对咸阳故城重新做了一次大面积的文物复查。随后,给省文化局打了请求恢复发掘的情况报告,也得到了批准。9月15日,正式成立了“咸阳考古工作站”。这标志着秦都咸阳考古,经过10年的停顿之后,又恢复了工作。

咸阳考古工作站由陕西省文管会的负责人杭德洲兼任站长,咸阳博物馆的马建熙为副站长。工作站驻扎在咸阳塬边的牛羊村,田野工作也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首先,我们围绕塬边目标最显著的秦建筑群遗址,展开全面钻探。这工作是11月9日开始的,前边由廖彩梁、孙德润两位业务干部带领民工钻探,我紧随其后,用大平板测绘仪把他们钻探的结果测绘到图纸上。测绘显示出令人振奋的结果:原来在地表下1.4~2.2米的深处,隐埋着一个地跨咸阳塬上下的城址。此城的平面呈横向的梯形,即西墙长、东墙短。因遭受破坏,基部有多处断缺。周长2747米,其中北墙843米,南墙902米,西墙576米,东墙426米。基础部宽度多在11米左右。四面都应该辟有城门,但只钻探出西门和南门两座门址。

另外,我们三人还在东自刘家沟、西到聂家沟的广阔地域上,探出宫殿建筑群27处。这些宫殿从平面图上看,各自独立,形状不一。其中

有8处,就包括在探出的宫城之内。此城应当就是“冀阙宫廷”的宫城。

当我们忙于大面积钻探时,没有业务干部的咸阳地区文管会为了“楔”入工作站,置省文化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文件于不顾,鱼目混珠地以“这里也归咸阳地区管理”相要挟,上下其手地施展手段。一方面从长武、淳化等县调人,于1974年3月4日强行抢先开挖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中心地带,实施“遥控”;另一方面在上层领导中,展开游说;并把一个在戏剧舞台上没本事而转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安排成地区文管会办公室主任,利用他作“挡箭牌”,在大小会上对省里业务干部进行人身攻击、挑拨离间。省里为了照顾所谓“关系”,只好同意咸阳地区文管会的介入。此后,工作就不得安宁。

咸阳文管会单方面派人抢挖的一号建筑遗址,是在急功近利地“抓现成”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直接违反田野考古发掘规程,是破坏地层关系地“掏挖”。出土物混乱,致使工地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由于咸阳塬上的对宫殿分布的钻探工作暂告一段落,业务干部闲置。加上工作站内部矛盾表面化,杭德洲上任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工地上形成多头指挥,局面失控,于是省里就派吴梓林于1974年5月28日接替,作为“代站长”进入工地。在结束“一人独挖”



阿房宫遗址夯土

的呼声下,6月28日起,终于重新布方,才由多位省里业务干部参加共同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1975年11月,方告结束。

此次经我们全面的钻探,才知道这个一号建筑遗址除引人注目的高大土台之外,其基础部分占地很大。平面上是地跨今牛羊沟的“凹”字状,东西长177米。两端各有一个高台建筑,南北进深45米。中间的门道,已被后期的牛羊沟水所破坏。但这一中心位置,自然也就成了此一整体建筑的南北轴线,使东西两部分对称。可惜东端的夯土台基,早年遭到破坏而在地面上荡然无存。西部的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残高6米。经发掘复原,原是个多层次、多居室构成的高台宫室建筑。

这时还处在“文革”时期,咸阳地区文管会的人,“拉山头”、“先下手为强”的造反劲头还十足,弄得人心涣散、工作无着。自1975年之后,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又陷入了停滞、无序的状态。地区文管会没有实干一天而凭借权力攫取资料,背着

我们实际参与者,就偷偷发表了《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不但公布的材料失实,还把我等形成的图纸改头换面,为了在“评法批儒”时制造轰动效应,提高个人声誉,竟把荆轲刺秦的“咸阳市”范围圈定在渭河南北,闹出了“咸阳市大于秦都咸阳”的笑话。

“文革”中的投机作风,在这时的秦都咸阳考古业务上暴露无遗。有良知的业务干部们,对此只有叹息的份儿。因为我不是“党的人”,不可能得到信任,还容易当“替罪羊”。所以在1976年4月30日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去了秦俑博物馆筹建处,后转入考古队,参加兵马俑的发掘。

秦都咸阳的考古就这样长期停滞下来。尽管1980年10月至1982年9月期间,对二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也对西起黄家沟、东至柏家嘴一线以生产建筑材料的陶窑做过多次调查,并做过部分发掘,但由于用人不善,竟导致野外考古无什么起色,以至于到1990年后工作就完全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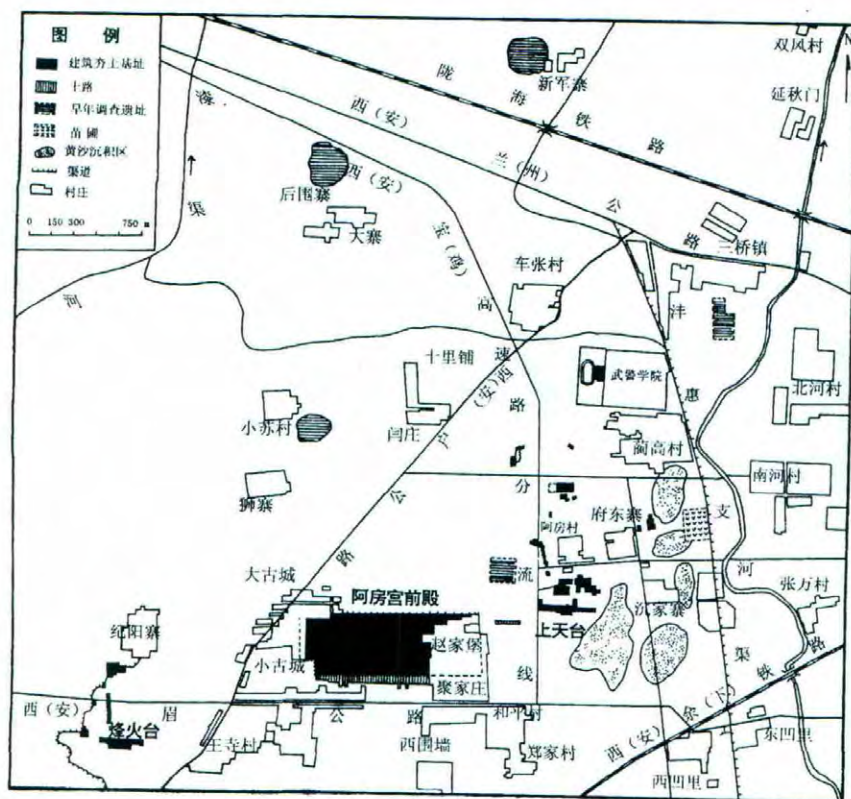
宫阙楼台在隐约中浮现

说到咸阳,人们首先想到它那巍峨的宫殿建筑。唐代李商隐在《咸阳》一诗中的描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写道:“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的宫殿门阙、楼台周阁,千门万户,座落重重,显现着一代的强盛与繁华。但竟毁在秦末项羽的一把大火之中。

关中有多少宫殿?据《史记》载有“三百”。在《汉书·贾山传》、《三辅黄图》等书上也是这个数目,说:“秦起咸阳,西至雍,离宫三百。”《秦始皇本纪》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入之,各案署不移徙。”这里的所谓“雍”,我以为绝不是指今凤翔县,而是秦都咸阳的“雍门宫”。

“咸阳之旁二百里内”,这又是个什么概念?长期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1汉里=417.52米,“二百里”合83504米,即83.5公里。如果指的是东西直径,岂不连京都之外也包括了进来,那怎么能算“咸阳之旁”?

经我验证,这“二百里”指的是以“咸阳”为中心的一个地域范围,实际是地跨渭河两岸的一个大型闭合圈。即从今咸阳市塔儿坡(秦“雍门宫”的所在)起,循咸阳塬(“北阪”)东北行,至泾、渭之交,折而向南,过渭河,斜穿西安市东北角(“极庙”的所在)和西北郊(秦“兴乐”、“章台”诸宫的所在),再从三桥镇南(“阿房宫”的所在)转往西北,越渭河,返抵咸阳市东郊。这就是说,在这一广阔的范围之内,当时密集地分布着270多座宫殿。可惜,经过两千多年的消磨,能调查到的遗迹却



阿房宫遗址平面图

是少得可怜。

咸阳塬南侧二级阶地上的秦宫遗址,经我等调查知,以今牛羊村为中心,东到杨家湾,西至毛王沟,都有分布,可称之为“北阪宫区”。其中尤以聂家沟东至三义村的一段最为稠密,近达30处。这些宫殿遗址虽然在建筑体量上有主次之别,但也因为“周阁相属”的关系,彼此难于分开,当然也难于各自成为独立的座落。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的宫殿群落比较驳杂,时间跨度不一,早期的经过多次修葺而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式。同样,结构与功能也不一致,没有朝寝的区别,这完全符合“各案署不移徙”的情况。可以想见在这里,既有孝公时期的“冀阙宫廷”、昭王时期的“咸阳宫”,也有秦始皇“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的“六国宫室”。

经发掘而复原的一号建筑,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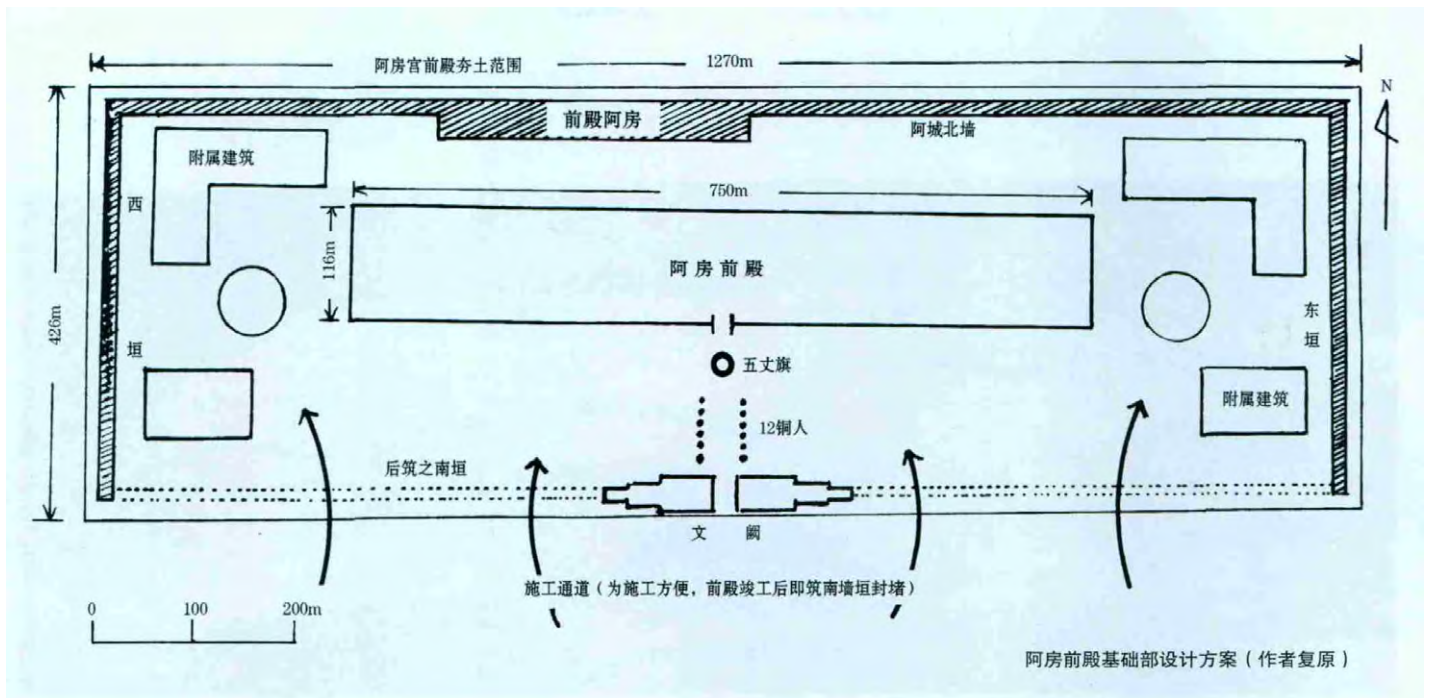
量硕大,结构奇特。它依据两个大型的夯土台基,分别由底到顶三层建屋,高可17米。两建筑间,下为“阙道”,上有“飞阁”、复道相连。对建筑材料取样,经¹⁴C测定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340年。如果我们再把它后部和东西两翼分布着的8处大型宫殿遗址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这一处群体建筑的时间跨度长达140多年,其名称更符合《史记》上“冀阙宫廷”的称呼。

有一段时间,新闻媒体对“阿房宫考古队”做了大量的报道。说什么阿房宫并没有建成,火烧阿房宫是“误解了司马迁,冤枉了楚霸王”。我觉得这是把“阿房宫前殿遗址”当做“阿房宫”了,实际是概念混淆的结果。

所谓“阿房宫”,我认为并不是一座宫殿的名称,而是一处皇家园林式的宫殿群落的临时称呼。建宫

的初衷,按秦始皇的说法是:“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朝宫”是皇帝举行大朝的地方,涉及到国家大事议政都得在这里举行,当然是把它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物来对待的。所以,在选址、规划、施工上,都特别讲究。渭南岸的丰、镐之地本来就是一处风景优美而且早有秦宫的地方,于是他就就在原有宫殿基础上做了大规模的新建、重建或改建。宫址的集中区,约在今西安三桥镇一带,北起新军寨、后围寨,南至王寺村、和平村北,南北纵长5公里;东以皂河为界,西迄长安县小苏村、纪阳村,横宽3公里,总共占地约15平方公里,其间有建筑与湖泊遗迹穿插分布。不同形状的建筑群重重叠叠,在三桥镇南仍有20余处。虽然项羽一把火烧毁了它那凌空雄伟的木作构架,存留在地面上的筒瓦、板瓦、瓦当、铺地砖和五棱管陶水道、漏斗、原石柱础等建筑遗物还随处可见。阿房宫考古队认为这些建筑遗址是“秦上林苑的东西”,不属于“阿房宫”范围,但战国时期这些“秦上林苑的东西”难道跳过了秦帝国15年时间,压根就没有被利用?难道秦始皇建造“朝宫”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的“前殿遗址”?

1999年,我在《咸阳帝都记》一书中写道:“在前殿遗址的北边,有土梁地形,呈东西走向,基宽约15米”,并据宋敏求《长安志》一书说“三面有墙,南面无墙”的记载,推断其为“阿城”的北垣墙;至于“南面无墙”,那是施工程序的安排。另外,北墙中部偏西一段墙长323米、厚15米,而且内外两侧有瓦片堆积。而其他墙段厚仅11.5米,说明中段原来在墙上面是有建筑的存在。



我以为那就是《史记》上所言的“前殿阿房”。

前殿的夯土台基,至今仍高出地面7~12米,东西跨度还有1320米,南北进深仍在420米以上。原来在三面有墙环绕,除过北面有大型的附属建筑——“前殿阿房”,面对的却是一个大型的广场,这正是“室堂未就”的反映。

秦阿房宫地区处于沱河与沔河之间,北自三桥镇的新军寨、后围寨,南达“烽火台”、阿房宫前殿、

“上天台”遗址一线,都应是“阿房宫”的范围。于此,我们应该明确的概念,由大到小的是:秦上林苑阿房宫 阿房前殿 前殿阿房。

岁月流逝,风光不再。秦咸阳所有的宫殿建筑不可能、也不必要尽数,其中名实相符、有遗存可以确指而未被发掘者,我们还是可以指出有:兰池宫(渭河电厂所在的杨家湾)、雍门宫(今咸阳渭城区塔儿坡一带)、望夷宫(今泾阳蒋刘乡福隆庄、余家堡和咸阳市的史村、徐家寨一带)、兴乐宫(今汉长安城长乐宫旧址上)、章台宫(今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旧址)、甘泉宫(即“南宫”,今汉长安城桂宫旧址内)、霸宫(芷阳宫,地当今临潼韩峪乡油田村附)。

另外,经过调查,虽有遗存,但不能确定名称的宫址还有:秦咸阳西行大道上几处滨渭宫殿遗址、滨沔的东马坊秦宫遗址等。

尽管史书上记载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如果宫各有名,也不至于留下的宫名就是

这么几个。这很可能是以群体建筑为单位的一种称呼,像“阿房宫”,就属于这座园林式朝宫的总称;“前殿”也仅是其中之一。同一道理,“甘泉宫”中也有“前殿”,“章台宫”也不是只有一个台子……那么,270座宫殿,恐怕就是由单体宫观统计出来的总数。

不管怎么说,秦宫殿原来有名称的毕竟是少数。而在历史老人手里留下有遗存可以考见者,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如果再加上人类活动频繁、破坏力加剧的今日,恐怕这“少数中的少数”行将变为历史记忆中的符号了!大概出自我几十年来同“秦”结缘的关系,经手秦都咸阳的考古发掘,固然看到“宫阙楼台在隐约中浮现”,但也看到这些历史遗存正在日益消退着。惟恐“白驹过隙”之神速,唯一希望管理机构把想法变为行动、把号召变为落实,切实加大保护力度,唤醒人们的“文化遗产”意识,能把这“浮现”长留人间。A

